

周乃复 著

蹒跚二十年集

黄远澄书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蹒跚二十年集

周乃复 著

二〇〇四年

此书得以编成出版，与胡炜铭、朱冠璋、童银舫等朋友的鼓励、支持直接相关，特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蹒跚二十年集

著者：周乃复

出版发行：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一百二十三号三楼

电话：二六七〇六六三三

传真：二六七〇一三八一

印刷者：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定价：港币二十五元

人民币二十五元

二〇〇四年一月初版·香港

ISBN 962-450-500-4/D·46277

求知道上蹒跚行

在編集《寻绎慈溪文化之源流》时，我的一批与该书题旨无关的文章也被收集了起来，约有30余万字。《寻绎》出版后，我把这些文章翻阅了一次，突然发现它们恰好反映了我几十年来无果而终的求知历程，清楚地显示了我之所以夙志未酬的根本缘由所在。我们这一代在反右前后毕业的大学生，常为生不逢时而叹息，总自觉不自觉地将人生的失落全归咎于环境，很少注意到事业无成的主观原因，这显然是很偏颇的。我明年就到70岁了，为了给自己在求知上的劳而无获一曲挽歌，决心从中选出一部分来印本书，定名为《蹒跚二十年集》。这本书的集印，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纪念，是对已逝岁月的凭吊，也有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藉以自慰的意思；当然，对于那些在治学素质上和我有类似缺陷的青年朋友，或许也是一个可供参考的借鉴。

回顾我将逝的一生，在求知的道路上，也算上下求索过，但整个的所谓求索过程，却一直处于迷惘和彷徨之中，始终无所适从。

我不否认我的求学时代虽非常艰辛，确也很美好，值得追思。我家境贫寒，只断断续续受完了中等教育：插班进的嵊中，初中只学了两年；中师未读完，又于1956年春被报送到高等学校，也算难得的幸运。在大学的一年半时间，严格说来不过是进了一期短训班。但由于学校对我们这批报送生的重视，当时在校的著名学者，例如姜亮夫、夏承焘、王驾吾、任铭然、孙席珍、吕漠野等先生都无例外地给我们上过课，为我打开了知识宝库的

大门，教给了在知识海洋中探宝的基本技能，激发起追求知识的强烈愿望，展开在我们面前的，的确是最最美好的前景。师长们的学识和他们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于是，希望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成了我人生追求的目标。但正当我踌躇满志设计着未来人生的时候，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我崇拜的前辈，一下子几乎全成了“阶下囚”，或扫校园、或管门卫，最“幸运的”也成了图书管理员……，我的未来人生设计的模板就全粉碎了。我就这样带着迷惘和彷徨走向生活，在此后的数年中，除了努力教学和无目的地阅读之外，再也不敢作什么人生设计了。

1962年以后，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深藏于心中的“希望在求知上有所建树”的思想又蠢蠢欲动起来。但这一次，在选择研究课题时又犯了大错：我那时心气还是相当高，在求知上不想人云亦云，但又深知人文科学上的任何创新在现实中都是极其危险的。于是我天真地想在人文科学中找一个远离阶级斗争的项目，希望既可以大胆创新又可触及阶级斗争那可怕的“纲”。我选的就是“形象思维”的研究。于是调整订阅书刊、阅读专业教材、了解研究现状、摘录资料卡片，按着老师们教我的方法，开始做起学问来。四年之后，自觉有了点准备，就想试试刀了。当时，我国形象思维研究上的权威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方名教授，正在《光明日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我就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王老的论文提出我的看法，同时写出我的研究计划，请王老指导。想不到这信得到了他的热情鼓励，被称为“来自东南沿海的空谷足音”，当时的高兴劲，现在想起来还很激动。但正当我满怀信心准备大干一场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王方名教授就上了《人民日报》，成为需批倒批臭，还要踏上一只脚的“大黑帮”、“反动学术权威”。我终于还是撞在了“纲”上，于是诚惶诚恐地烧毁了与王老的通信，大量的笔记和卡片……。好在我的所谓研究，因为怕被指责为不务正业，从不向人提及，总算没有败露，但那一阵惊吓，实在让人忐忑不安。

两次挫折使我决心中断已学的专业，于是始而读中医、中药

书，上山采中草药；继而学电子技术，用视波管组装电视接收机；最终悉心研究设计当时国内还没有的电子琴，居然取得了成功。我当时是想借此由文转理，走另一条人生的道路。我的这个打算最终还是破灭了。我是一个在编的中学语文教师，一到学校教育恢复了正常，就理所当然地被调回来教语文。于是我就像鲁迅笔下的“蜂子或蝇子”，“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不过我是三次都没有飞起来，只是振了振翅膀，始终停在原地而已。这就是我的年轻时期的所谓求索。记得1998年秋，长影厂长宫喜彬先生在送我的《演艺春秋》上题词：“回忆青年时代是最美好的。”其实我的年轻时期并非如此，反倒是很不堪回首。

重回文科教学专业，已是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按理说该是我实现夙愿的大好时期。可惜我思想上已背上了因袭的重担而不能自拔。正当大批知识分子若久旱逢甘露般重新走上求知之路时，我却观望、犹豫，总认为领袖的一句话扭转了形势，仍可能用另一句话逆转过来，“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风暴，不是不可能的，还是少自讨苦吃吧。何况对已荒废了十多年的本专业，我的信心也已大打折扣，我于是混混噩噩地活着，闲着无事，就利用已学的电子技术，当个修理工，为人修理修理家用电器。到1982年，形势是越来越好，深藏于心底的愿望才又苏醒过来。于是就联系我的工作实际，写了一篇题为《乡土材料与思想工作》的论文，引起了几家学报的注意，最后在中央教科所的《教育研究》上发表，并受到了《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乡土》等报刊的推介，使我找回了求知的信心，决心再次定位我的求知范围，决心再次在知识的海洋中寻求自我的价值。

在再次定位我的学习和研究范围时，我的思想下意识地受到了前几次挫折的阴影的束缚，我给自己订了一条原则：学习、研究和写作的内容，都必须限定在我所从事的工作范围周围，决不越雷池一步。于是，教书时，写关于教育学、语言学、文学方面的文章；到了方志编辑室，就写关于地方志方面的文章，决不越

界。比如在从事中文专业教学时，我曾确定了一个研究“存活在现代汉语中的古汉语成分”的课题，计划对诸如古人语言中怎样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如何充分合理地利用它们？选择时有哪些科学标准？活古语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有些什么作用？如何防止或纠正活古语使用中的不良倾向？古语活用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应加以总结？活古语研究与现代汉语教学有什么关系等等进行系统的研究，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显著的现实意义。为此我列出了十余个分支题目，开始了切实的学习和探索。但就在我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发表了最初的数篇论文之时，我奉调到方志办工作。怎么办？我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按我自定的原则，忍痛中断了这项研究，几乎有两年多没有写东西，直到我自认为有了地方志方面的发言权之后。这是我在求知上有点滴收获的阶段，但由于不断地转换阵地，在每个阵地上都是新上阵的新兵，文章内容之浅薄，当不在话下。

“人生苦短”，在求知上刚摸到点边，暮回首已到了“尚能饭否”的退休年龄。不过，刚面临退休时，我却没有这类伤感，相反著实亢奋了一阵：退休了，没有了工作的压力，摆脱了人事的纠缠，我可以一门心思做我想做的事了，似乎靠这余年还能实现我的夙愿似的。但当我静下心来再一次定位我的求知方向时，竟发现在我的所谓知识积累中，根本就找不到一块即使是可以建一间小平房的地基！我发现我的阅读面虽相当广，但其中几乎没有一个领域是有扎实的根基的，拿来夸夸其谈可以，想在上面建树点什么，简直是痴心梦想。面对这样的尴尬，我只能退而求其次，确定了晚年继续求知的三个目标：一是在学习电子技术的基础上学习计算机技术，争取在时髦的文献数字化上做点事；二是借着参编地方志带来的影响，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地方文化书籍的编写工作；三是在我一生阅读所得的簏箕中拨拉拨拉，在大量垃圾中搜寻尚可利用的碎米粒，给报刊写点短文。这说得好听点叫量力而为，说得直白点就是胸无大志，就叫“老大徒伤悲”的无可奈何！对于那看起来相当前卫的“文献数字化”，不过也是

一种取巧，在计算机程序员往往不太读得懂古文、文献专家们又不大了解计算机的情况下，我滥竽其间倒也能为双方所接纳，算是碰巧厕身其中演了个小角色。

我的《蹒跚二十年集》，收的就是当教书匠时的“论语言文学”，当地方志编辑时的“论方志编纂”和退休后的“谈文献数字化”三部分文章，那些碎米粒则不予纳入，将来有机会时再考虑集印，或许可以名之为《秋斋碎米集》。对这《蹒跚集》，分开来读，它们是不同的专业领域的一些浅知庸识；合起来看，却是我1982年以后，在求知道路上犹豫、凌乱、蹒跚的履痕。前者，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点滴体会；后者，则有相当的代表性；我要留为纪念的，主要就在此。

我夙愿未偿当然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但根本的原由却在个人的素质。其中最主要的有如下二方面：首先，我一向以热爱知识自居，现在想来实在汗颜，试看我求知上的多次定位，有哪一次是将知识放在首位的，哪里还有一点“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上下求索”的精神，而没有坚定的一往无前追求真理的理想，就不可能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行动。现在一切已成定局，我只能无可奈何地按我选定的三件事继续做下去。其次，我在求知上，始终违背了“术业有专攻”（韩愈语）的古训，往往脚未站稳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转移阵地，劳而无功是必然的。这和我上述不当的处世哲学相关，也和我常常抵挡不了兴趣的诱惑有关。

写完此文，再来读李商隐的《乐游源》，心头有了一种别样的滋味：“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2003年7月4日

〔附言〕关于本书中的图片。

二十年来，师长的教诲，友朋的鼓励，始终是我努力前行的借力。因此，在编集本书时，着意收录了部分师友的合照，以作留念。

收录在书中的图照，有的是配文图片，用以补充文字叙述之不足；但多数是与文字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因为将照片集中排版不大好看，才分别插在各专辑的文稿中，目的仅仅在于将值得我纪念的那些瞬间留存下来，日后时时翻看，可时时感受到还有一些师友在，希望我不断努力，我若因此而有所长进，师友们也一定会为我高兴吧！



周乃复、徐雪芬近影



目 录

求知道上蹒跚行（代前言）

论语言文学

“活”古语的研究与教学	(3)
试论“活”古语的修辞功能	(11)
成语与古汉语	(22)
“灰色卑琐的人生”	(26)
新的题材、思想和人物	(33)
新颖的艺术构思 鲜明的人物形象	(40)
文艺理论学习与《论凤姐》	(47)
上下求索中的小说创作	(52)
“月亮船”扬帆驶向大海	(56)
《山乡巨澜》的启示	(60)
迎接山花烂漫的春天	(63)

论方志编纂

新编地方志面临的几个问题	(69)
--------------------	------

谈方志编纂中资料的整理和加工	(76)
关于现代逻辑在方志编纂中的应用问题	(80)
从《上虞县志稿》评议会谈志界优良学风	(84)
关于实施《〈慈溪县志〉分志稿编写通例》的几个问题	
附：《慈溪县志》分志稿编写通例	(88)
《慈溪县志·盐业编》成稿书感	(97)
关于县志总纂的思考	(100)
方志地图的特征及其制作	(105)
关于《慈溪县志》编纂情况的汇报	(111)
漫谈志稿的评后深加工	(115)
《慈溪县志》编辑偶记	(122)
《慈溪史志选刊》编辑说明	(127)
为了无愧于社会主义新方志	(129)
新图志编纂刍议	(143)
中外地方志比较研究的肇始之作	(152)
童银舫《方志札记》序	(158)
给天台县志办同仁的信	(160)
谈谈地方志索引的编制	(163)

谈文献数字化

关于地方志出版媒介的革新	(177)
《新兴的城市慈溪》后记	(184)
《浙江省新编县（市）志资料集萃》编后记	(189)

介绍一个高性能的数字文献处理系统	(191)
几种有特色的电子读物	(199)
关于地方志信息网的建设	(204)
我的家庭数字图书馆	(209)
《古今图书集成》电子版检索方案	(211)

作者编著简介

论语言文学

LUN YU YAN WEN XUE



收在本辑中的是两类文章，一是关于语言文学的几篇论文，二是对慈溪文学创作的评说。前者是我担任中文课程教学时，与教材相关的一些研究心得；后者是我任作协负责人时对慈溪文学创作的一些想法。把这些时过境迁的文章集印出来，除了留作纪念外，还有另外的考虑。

我一直认为，中学语文教师的再教育，最关键的并不是现在流行的教材教法的培训。不是说教材教法不重要，教材有调整、教法有革新，教师自然要加以研究。但这是教师日常备课的主要内容，并不是教师自身提高的主要目标，用于对新教师的辅导是必需的，对老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却不是根本性的，有时反而会增加教师的依赖性，会影响教师的独创精神。语文教师的业务素质，主要是教师本身的阅读分析能力和写作表达能力。而阅读分析能力，则与文艺理论、语言理论、逻辑理论、阅读理论密切相关。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上述理论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变化，早年大学教学多未涉及。补上这方面的知识与能力，就显得非常必要。再说写作表达能力，中小学语文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教学语言是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如果他们不经常进行有关说明文、记叙文、论说文的写作实践，没有切身的写作体验，就很难进行有效的写作指导。他们的所谓作文指导也只能是别人经验的转述，难免隔靴搔痒。我也偶尔了解一下语文教师的业务进修情况，几乎没听到有新文艺理论、语言理论之类的讲座，也没有诸如语文教师写作比赛之类的活动。相反，倒听说有人把语文教师参与此类校外活动视为不务正业的。我的这组文章，可用以说明我工作后的进修办法，反映了语文教师提高自身素质的最主要的途径，希望有助于开拓语文教师再教育的思路。

“活”古语的研究与教学

——“活”古语研究之一

在现代汉语中，还活跃着一部分古人的语言，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一要研究其发掘和运用的规律，二要研究还保存在其中的古汉语特点，用以指导学习古人语言的工作，指导语文教学中有关方面的改革。本文拟就“活”古语研究的意义、内容和现状，并联系教学实际谈一点粗略的看法。

—

关于学习古人语言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有了可供遵循的根本原则和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在理论上，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都有过全面的原则指示。他们首先肯定这种学习的重要性，同时又都反对古语的烂用。^①在实践上，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从我国历代语言的宝库中，汲取了大量有生气的东西，提高了现代汉语的严密性和表现力。不过，我们现有的理论还只是十分原则的指示，远没有具体化和系统化，对语言巨匠们“复活古语”的丰富经验，也未能作出系统的总结。有关的文章和讲话虽然不少，但往往是片断的经验之谈，常带有某种片面性，而且说法不一，标准各异，致使学习古人语言的工作缺少具体的理论指导。有许多问题，例如：古人语言中怎样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如何充分合理地利用它们？选择时有哪些科学标准？如何防止或纠正学习中的不良倾向？如何正确对待古语的变迁，其中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等等，都还未能很好解决，使青年同志和语文教学工作者无所适从。使忽视学习古人语言和烂用

3

『活』古语的研究与教学
HUO GU YU DE YAN JIU YU JIAO YUE

论
语言学

古语的现象未能根本解决。茅盾同志一九五三年就指出过：“鲁迅作品是尽量注意利用了古人语言中还有生气的东西的，现在我们的大多数作品中连鲁迅所利用过的，也没有继承，更不用说自己去发掘了。”而另一方面，“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在我们这里却并未绝迹。”^②这种情况，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并未完全解决。

学习古人语言这一工作的指导原则不够具体不够严密的情况，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下面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我们长期以来有过一个反对半文半白的口号，这个口号一般地说，当然还是对的。但是如果把它看作绝对化的标准，却就未尽恰当了。因为，要充分合理地利用古人语言，在现代文中适当地用一些古人语汇、典故和句式，那么文白相间就是必然的，怎么避免呢？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的文章，常铸文白于一炉，写出许多惊人的妙句，叫人拍案叫绝。请看：

(1) “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别了，司徒雷登》）

(2) “‘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反对党八股》）

(3)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纪念刘和珍君》）

(4) “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们其欣喜为何如？”（《论雪峰塔的倒掉》）

象这样一类妙趣横生、寓庄于谐的半文言半白话的文句，读



作者摄于东山头寓所